

西方民主的系统性危机与民粹主义的兴起

□ 郇 雷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走过将近10个年头。10年来,资本主义危机从经济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成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可以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遭遇到了系统性危机。西方民主的系统性危机,主要是指所谓的自由民主制度的逻辑困境,难以自证其说,而且成为经济低迷、社会冲突、政治动荡的致乱之源。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民粹主义思潮应运而兴,迅速衍化为一股重要政治力量,对西方社会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认真剖析西方民主危机与民粹主义的逻辑关系与事实联系,有利于我们客观认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变迁,也对我们自己的发展具有镜鉴作用。

民主与民粹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民主与民粹是两个不同的政治概念,但是两者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人们对于民主与民粹的评价截然相反。一般认为,民主是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和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而民粹主义则被认为是一种消极的、负面的政治思潮。但是,民主与民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统一性与重合性。它们都以“民意的合法性”为话语基础,都反对漠视民意或反民意的专制权力。所以,民主的发展必然包含民粹,民粹主义也内涵民主成分。从近代以来的人类政治进程看,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如影随形,难以决然分离。在现实政治中,很多情况下民主与民粹是糅合在一起的。如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两件事既可以看成是英美选举民主的自然结果,也可以被看作是民粹主义思潮的反映。

那么,民主和民粹的区别何在?第一,民主从广义上虽然是指“人民的统治”,但“人民的统治”是通过制度化、体制化的方式实现的,而民粹主义则单纯追求民意的实现,民意表达混乱不清,而且缺乏稳定性,易受周围环境甚至某种偶然现象的影响。

除此之外,民粹主义具有反体制、反制度、反现代化的倾向。第二,民主理论流派虽然众多,但是民主理论与制度的基础是比较成熟的,而民粹主义本身没有一个系统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只是一种具有群情性质的不成熟观念,其价值追求是模糊不定的。民粹主义在价值上缺乏独立性,它可以与任何一种政治理论相结合,成为某种政治理论借以发展扩张的工具。所以,欧洲的民粹主义历来有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区别。民粹主义只能是一种社会思潮,而称不上是一种理论。第三,民主既具有批判性,又具有反思性,而民粹主义虽然具有批判性,但缺乏反思性。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民主促进了人类的政治解放,社会主义民主则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里强调的就是民主的批判性价值,但是民主的批判必须建立在反思自身的基础上。而民粹主义则一味强调批判,一味追求颠覆秩序和改变现状,故而是一种激进的、难以驾驭的理念。

西方民主困境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现代民主社会,民粹主义往往被看成是民主政治的异化状态。因此,人们将民粹主义视为民主政治运行的晴雨表。以此观察西方国家的政治,我们会发现,西方民主陷入困境之后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社会基础。

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声称可以通过代议制民主的方式实现民意表达,但是现实中的代议民主越来越远离民意。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自由民主制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民主,体现的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利益。金钱与选举的紧密结合历来不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秘密,在强大的金元政治的攻击下,选举民主从“一人一票”蜕变为“一美元一票”。与强大的资本财团相比,广大人民虽然人数众多,但是难以影响选举民主的实际结果。久而久之,选民就会对投票失去兴趣,政治参与的热情也随之下降。实际上,近年来西方各国的议员选举、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呈现出了下滑趋势,民选政府多数情况下是在投票选民的相对多

数基础上产生的,而非全部选民的多数。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公共政策正在丧失民主性,在激励偏袒资本利益的同时,拒绝为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埋单。在美国,政府的公共权力已经被来自华尔街的金融资本所垄断。富人群体不仅通过政治献金影响选举,而且广泛游说议会,推动制定留有漏洞的税法、阻止提高最低工资、抵制医疗福利制度改革、限制工会活动、推动金融去管制化等公共政策。这些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中产阶层进一步缩减,人民福祉不增反降。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民主政治充满了不满与愤怒。近年来的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桑德斯旋风”就是这种反精英、反现状情绪的民粹主义表达。

在欧洲各国,由于自由民主制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低迷、失业率高企、外来移民、文化认同等,传统主流政治精英对此束手无策,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的失望情绪高涨,这就为那些夸下海口的、极具煽动性的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不管是右翼的英国独立党、法国国民阵线,还是左翼的西班牙“我们可以党”、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这些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其实都是在自由民主制度困难重重、传统政党政治和精英政治功能失调的背景下实现的。

民粹主义导致西方民主的不确定性增强

民粹主义思潮下的西方民主将何去何从?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传统的自由民主制将宣告终结。西方学者欣德斯曾认为:“在西方,人们已经忘掉了古希腊的民主观念,民主原则已经死亡,我们的理想落空了,我们没有良方可摆脱民主实践和理论的困境。我们正遭受最深层次的民主危机。在现实政治中,人们谈论‘民主’其实只不过是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操纵‘民主’概念来批评或吹捧现实政权而已。”我们需要注意,民粹主义虽然饱含批判精神,但它还算不上民主的革命者,无法为民主的未来提供建设性方向。作为西方民主危机的

一种社会反映,它实际上是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控诉。但是从长远看,民粹主义还难以突破西方根深蒂固的自由民主传统。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指出,民粹主义的兴起无疑会给西方民主的未来带来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可能对民主的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比如19世纪末俄国的民粹派号召“到民间去”,揭露了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实质,客观上促进了俄国革命的爆发。法国大革命借助人民的力量,推翻了专制王权的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但是,民粹主义如果得不到及时遏制,一旦与某种极端思想结合,就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峻挑战。

西方自由民主制能否从民粹主义思潮中康复,取决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能力。长期以来,人们便丧失了对资本主义民主的信任与信心,在复杂而难解的社会问题面前变得焦躁不安、义愤难平,民粹主义就成了社会大众反抗资本主义非理性但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干预中东政治进程,造成了伊斯兰世界的混乱,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由此产生。这些问题作为一种报复手段反向流入西方社会,成为困扰西方国家的重大安全问题。民粹主义利用人们的恐慌情绪,树立起了反对难民甚至是种族主义的旗帜。而在国际经济领域,资本囿于增长的难题,往往将问题指向国际社会中的竞争者,从而扛起了贸易壁垒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大旗,反全球化的思潮也由此兴盛。特朗普推出的一系列政策,如建立美墨边境隔离墙、推行“禁穆令”、退出“巴黎协定”,置国家道义与国际责任于不顾,让人们对于自由民主制大跌眼镜。当前,民粹主义严重冲击了自由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所谓的包容、自由、平等、人权精神。西方自由民主如果要走出民粹主义困局,就必须充分反思其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调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关系,重新认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些问题处理得如何,将决定自由民主制是通过调整实现暂时平衡还是要滑向深渊。

战略视角

7月10日至17日,美印日三国在印度南部金奈港及附近的孟加拉湾海域举行“马拉巴尔—2017”联合军演,共有包括3艘航母或准航母在内的16艘主战舰艇、2艘潜艇及近百架岸基作战飞机和舰载机参加,创下了“马拉巴尔”军演的历史之最。

“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始于1992年的美印双边协定,因演习地点位于印度的“马拉巴尔”海滩而得名。近年随着美国“印太安全战略”的出炉和印日的战略调整,这个本是美印之间的双边演习因2007年日本的加入而变为三边演习,2015年更是接纳日本成为第3个正式成员,此后交替在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海域举行。“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由双边扩大到多边,由印度洋扩展至太平洋海域,演习规模逐年攀升,当前已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军演之一。作为美印日最重要的海洋安全合作形式,其战略针对性不言自明,而今年的演习又以“潜艇搜寻”为主题更是耐人寻味。

长期以来,反潜作战并非印度海军的强项。对于印度而言,联合军演有助于观察和学习美日先进的反潜装备和丰富的反潜作战经验,弥补自身反潜作战能力的不足。对于美日来讲,与印度开展联合军演,一方面增强了装备、人员和技战术的互通,为未来印太海域的联合作战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又打开了窥探“基洛”级潜艇等俄制武器的窗口。

“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规模扩大与水平提升,是美印日战略互动、战略共振进而达成深度战略合作的必然结果。美印日已达成基本共识:“一个强大、繁荣的印度能让日本和美国获益,一个强大且繁荣的日本也有益于印度和美国,美国继续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有利于印度和日本。”在此逻辑语境下,美国在美印日海上安全合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谋求将日印两国打造为“印太安全战略”的东西两翼,并构筑美印日战略三角,进而巩固印太地区海洋集体安全。

印度自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积极推动“东向行动”政策与美“印太安全战略”对接,两国防务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6年6月,美印签署新版《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将两国防务合作升级为“联合研制”,深化防务技术转让和军工合作。同年8月29日,美印防长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允许美印两国共享对方的军事基地。今年4月,特朗普政府给予印度“主要防务伙伴”地位。6月莫迪访美,美国批准向印度出售22架MQ-9B无人侦察机,双方同意扩大“马拉巴尔”联合军演的规模并举行更多联合军演。美国还支持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

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与日本的“南下战略”也找到了战略对接点。印度外交秘书苏杰生近日表示,印度在执行“东向行动”政策的过程中希望加深与日本的战略关系。日本则希望借助印度,拓展在印度洋地区的影响力,保障印度洋战略通道安全。近年来,印日两国军政高层往来频繁,建立了外交国防副部长级的“2+2”对话、国安会对话等双边机制。

有分析认为,中国既是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不断加深的动因,同时也是美印日海洋安全合作的主要对象。虽然美印日尚未建立起同盟性质的战略关系,但其借助“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构筑的战术、装备和情报互通机制,将成为三国以间接方式联合制衡中国的重要手段。

印度作为二战后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中坚力量和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国之一,“战略自主”被历届政府奉为主臬。当前美印日海上防务合作所折射出的战略指向和地缘竞争态势,表明印度长期以来所秉承的“战略自主”战略理念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正面临着偏离轨道的风险。如果说印度出于务实而加强与美日的海上安全合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印度始终以中国为假想敌,通过拉帮结派围堵中国来弥补中印战略差距的话,则未免短视和单纯了。

热点透析

拓展金砖五国信用合作新思路

□ 徐德顺

金砖五国信用发展各有千秋

巴西是“混合”信用管理的发展模式。私有征信机构和公共信用信息登记机构并存发展。公共信用信息登记机构主要由央行和财政部主管。没有与信用信息相关的专门法律,适用于信用信息的相关条款散见于宪法及其他专门法中。信用服务发达,有两大征信机构,其中由几乎所有主要银行共同参与组建的第一大征信机构,还是拉丁美洲本土资信报告服务提供商中的领头羊。还有许多以盈利为目的的中小型私有征信机构,服务于特定的市场细分。

俄罗斯信用法律体系完备,但信用业发展缓慢。2014年参考德国经验,颁布了两部征信法律,覆盖企业、个人和金融征信,并强调对个人信息保护。征信业由银行发起,起步于1995年,征信数据库仅对银行开放。俄认为西方信用评级机构降低俄信用等级不存在客观基础,于2015年组建了俄国国家信用评级机构。

印度是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信用管理体系。财政部和储备银行发起成立了信用信息局有限公司,储备银行出台了《信用信息公司管理条例》,证监会制定了《信用评级机构管理条例》。尚未制定专门的隐私保护法,个人隐私保护条款散见于有关法规。储备银行出于对本国评级机构的长期保护,规定外国评级机构只能以与本地机构合资或合作方式进入。在市政债券、中小企业信用评级和农村征信体系方面积累了经验。

南非具有较为发达的信用体系。征信业已有100余年的历史,信用信息系统比较成熟。信用市场二元特征明显,满足中上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双重信用服务需求。小额征信服务发达,弱势群体获得更多融资机会。2005年底,通过了《国家信用法》,成立了国家信用监督管理委员会,实现了南非信用市场的统一监管。

中国是政府推动、市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信用管理模式。以政务诚信、商务诚信、司法公信和社会诚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信用体系正在全面建设中。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成效明显,商务领域市场秩序好转,国际化营商环境正在形成。人民银行主导的金融征信平台较为完善,工商局主导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平台基础较好,发改委主导的互通互联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正在搭建中。2013年《征信业管理条例》发布实施,征信业走上了有法可依的道路。国内信用服务需求大,民族信用评级业初具规模。对外开放程度高,外资信用评级机构已享受国民待遇。

金砖国家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环境不一,信用管理模式与发展路径不尽相同。构建彼此认同的诚信文化与信用标准,制定共同遵守的信用核心价值标准体系;加强信用业经营与管理经验交流,促进信用业协调发展;注重共享与应用信用信息,努力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率。这些都有助于减少对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依赖,提高金砖国家在新兴国家乃至全球市场信用评级国际话语权。

金砖五国信用合作正逢其时

政府层面信用合作已有基础。2014年金砖国家发表《福塔莱萨宣言》,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建立应急储备安排。2015年乌法峰会首提合作设立独立评级机构想法。2016年《果阿宣言》进一步推动保险和再保险市场合作,探讨设立金砖国家评级机构的可能性。非政府层面信用合作也趋活跃。2012年国内市场化信用评级机构探讨中美俄联合建立非主权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设想。2015年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巴西第一大征信机构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资信信息、保后支持服务两个方面建立长期合作关系。2017年金砖五国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及新开发银行的负责人在浙江杭州共同签署了六方《总体合作谅解备忘录》。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9月厦门峰会,金砖国家寻求深化信用合作正合时宜。

金砖五国信用合作新思路

构建认同的诚信文化与信用标准。文化是信用的根,金砖国家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五国应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构建彼此认同的诚信观与契约精神、授受信机制。加强信用标准的研讨与磋商,制定共同遵守的信用核心价值标准体系。

促进信用业协调发展。信用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高端形态。五国应加强国际信用技术交流,相互取长补短,优势互补。重点分享在普惠信用与金融、中小企业征信、农村信用体系、市政债券评级等业务发展经验,以及在信用法治建设、民族品牌保护、信用信息安全等先进制度安排做法体会,共同完善各自信用管理体系,促进信用服务业协调发展。

加强信用信息共享应用。为抵御国际商务

欺诈,减少国际商务信用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信用信息搜寻成本,可充分依托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平台,推动金砖国家逐步共享市场信用信息,有条件交换公共信用信息,以便利企业多边贸易与投融资,降低交易成本与提高经济效率。

提高信用评级国际话语权。随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投入发展,客观公正且有利于金砖国家的国际评级需求更显迫切,五国联合建立评级机构的设想需要进一步研讨与推进。可共同筹建金砖国家信用评级业协会,与亚洲、欧洲信用评级协会加强合作与协调,缓解金砖国家对穆迪、标普、惠誉“三大”评级机构的依赖,提高在新兴国家乃至全球市场信用评级国际话语权。